

专题研究报告(二)



# 人文外交

## 中国特色的外交战略 制度与实践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2014年12月1日



## 目 录

前言 人文外交：动因及愿景	1
第一章 总论	4
第二章 人文外交的“中国特色”	14
一、 中国人文外交的文化基础	14
二、 中国人文外交的战略选择	20
三、 中国人文外交的制度建设	27
四、 中国人文外交的能力提高	30
第三章 国际经验与人文外交的当代实践	35
一、 发达国家开展人文外交的经验	35
二、 中外人文交流机制的现状与展望	45
三、 中韩人文交流展望：从历史学出发	49
后记	54

## 前 言

### 人文外交：动因及愿景

人文外交并不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今天之所以把它提上议事日程，得因于今天中国社会日益成为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的社会。特别是在网络的时代，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日益延伸为族群与族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种变化是深刻而又深远的。首先，过去的外交大都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出发，但在当今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网络时代，人类的相处、相互认知的单元开始突破国与国关系的框架了，从“国”的单元开始进入到族群甚至个体。因此，世界上存在着一个非常大的没有边界、只有语言这个障碍的社会，若突破了语言障碍也就变成一个真正的人类共同体。在这样的条件下，所谓的外交也好，国际关系也好，可能会日益地从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拓展至文化关系。在“人”这个要素日益成为主体要素的外交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心与心之间的沟通，可能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力量和平台。这是我们为什么会去关注“人文外交”的第一个主要原因。

第二，文化在今日的国家间关系、全球公民的互动中成为非常重要的力量。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文化不仅可以让外部的世界来认知一个国家，而且也可以塑造一个外部的世界。外部世界对自我的认知是一种建构性的认知，而不是单向的让你了解我的认知，文化能够建构外部世界的自我认知。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文外交既可以推动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也可以推动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推动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提升。所以它变成一种国家文化发展的重要机制，是推动一个国家文化自我挖掘、自我完善、自我进步、自我丰富的重要机制。可以说，就像当年外交能够推动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一样，今天它同样能推动本国的文化以及国民的精神建构。

第三，对于中国来说，文化在这个国家具有非常古老的传统。言

外之意，中国不是基于对某种形而上力量的信仰去建构自身的民族精神核心和国家认同，而是通过一系列的文化创造，包括制度的建构、生活的安排、习俗的塑造等来认同自己的族群、认同自己的国家，来建立一个合理的秩序。所以，当年的华夷秩序——从根本意义上讲——既是基于利益的建构，也是基于文化的建构。基于人文的外交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它与西方中世纪基于宗教的十字军东征所形成的格局是颇不一样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今天的欧洲在人权文化方面所具有的精神品质同当年的十字军东征并无多少差异，二者都是基于对“异教徒”的征服而确立国际秩序。中国的人文外交不是这个思路，对于怎样去建构世界、建构秩序、建构共存发展，中国人有其自己的思想渊源、哲学传统乃至文明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文外交可能是中国外交传统当中最为珍贵的东西，有可能对创造未来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非常有益的。

无论从外交、文化的发展以及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角度来说，人文外交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推动发展并加以研究的领域。

相对于公共外交来说，人文外交可能更侧重于文化在外交中的作用，而公共外交更侧重于民间的力量在外交中的作用。这两者是可以互补乃至相互依存的，但是侧重点有所不同。我们研究人文外交，可以从更多层面、更多维度去展开，可以想得深一点、想得远一些、想得大一些。我们一定要意识到人文外交对中国的独特意义，一定要从中国的文化秉性、国家秉性出发来考虑，看看人文外交能不能给未来的世界外交的行为、外交的形态提供一些新的思想原则和方式；能不能在人文外交里面提出中国新的外交理念，新的外交原则和精神，新的外交方略。可以说，人文外交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广阔的领域，不能狭窄地去理解它。

今天我们跟周边国家讲“亲诚惠容”，就是人文外交的一个很具体的呈现。“亲诚惠容”讲的是人跟人的关系。把人跟人的关系上升为国与国的关系，把家与家的关系上升为国与国的关系，把邻里的关系上升为国与国的关系，强调友善、亲和等价值观，而不是利益和权

力的关系、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不是我要征服你或者你要征服我。我们把中国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邻里之间、家业兴旺所应该有的人群之间、社会之间的价值和规范放到世界平台上面，所以才会有我们今天讲的那些对周边国家的整个认知的态度，这与西方国家对外部国家认知态度完全不一样。这就是中国的人文外交理念，西方人不一定能够理解。存在主义有一个哲学命题，即“他人是地狱”。虽然对这个命题有不同的理解，但中国的理念里不是这样的。中国的人文传统是一个宝库，能够从中挖掘出很多有益的外交理念，能够建构出很多新的东西，帮助中国人对当代外交和国际关系形成新的理解和尝试。

可以说，人文外交很大部分是中国的特色。人文外交不是简单的文化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的传统和特色。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我们过去讲中国传统文化，一言以蔽之——专制，但是千万别忘了，在中国所有的传统文化当中，人为最大。《中庸》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没有人，天地是化育不了的。所以才会有“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这些人文理念并不是近代欧洲才有的，而是可以从更早的中国古代文化思想里寻找到。因此，对于中国的自我认知必须发生一个深刻的变化。

我们将尝试着从人文的角度去研究外交战略和策略，把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研究跟人文学科联系起来、融合起来，在哲学层面、历史层面、文化的层面进行探讨，譬如，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应该如何处理未来的世界，如何看待人类的差异性，如何处理和平与发展的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理解和建构具有中国传统人文思想的外交理念和价值。

## 第一章 总论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人文的作用被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周易》里写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人文化成”。把天文与人文放在同等重要的对等位置，说明中国文化传统对人文的极为重视，有所谓“赞天地之化育”。

今天，把人文和外交结合在一起，并提出“人文外交”概念，这乃是中国外交理念的一个独创，也是当代中国外交实践不断开拓进取的体现。如果说当年倡导并践行“人民外交”或“民间外交”的做法是新中国外交实践中一个充满智慧的创举，那么，今天提出增强“人文外交”的作用，可以说是“人民外交”或“民间外交”在 21 世纪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国际社会更加看重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迫切希望加强与我国的交往与合作。但由于对中国真实国情缺乏了解，也由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差异以及对我国快速发展的不适应，国际社会对华误解、疑虑甚至偏见仍然存在，亟待加强对外增信释疑工作。开展对外人文沟通和交流活动，旨在增进国家以及人民之间相互理解和认识，赢得世界对中国的认同、认可和信赖。同时，当前我国国内公众对外交事务的关注度和参与度空前高涨，维护国家利益的愿望日益强烈。他们与政府一起构成我国人文外交的重要践行者。因此，有必要不断加强我国人文外交的制度建设以及增强人文外交的实践能力，包括适当借鉴国外开展文化外交的经验和教训。

—

在我国，人在外交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一直受到格外重视。开展外交活动并非局限于政府层面。以人民群众作为主体的民间外交，构成我国总体外交的重要形式和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党和国家领

领导人非常重视民间外交，并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紧扣世界形势的风云变幻，适时提出了各具特色的人民外交思想。到目前为止，它们大体可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 **第一个时期（1949年 - 1977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世界格局的影响，我国寻求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活动空间有限，民间外交配合政府外交的主要任务是要新中国“立足”。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了“人民外交”这种全新的外交形式，其主要方针是“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其战略思想精髓是“着眼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团结和依靠世界人民的力量，建立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为真正和平、平等的国际环境创建而努力，在促进国际关系发展时，既要考虑到政府的立场，更要争取人民的支持。

当时，周恩来便提出了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意义的问题，即“外交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外交工作是以国家为对象，还是以人民为对象？”他的回答是：“我们要团结世界各国的人民，不仅兄弟国家的人民，就是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我们也都要争取。但就外交工作来说，则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这一点要搞清楚。”在多次实际的外交活动中，周恩来不止一次地指出，我国的外交活动并不局限于政府，广大人民群众也有进行外交活动的权利与地位，“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不能单靠职业外交家来进行，更多地应该依赖两国人民直接地来进行”。这些话语表露出周恩来对外交本质的深刻思考和理解。

正是因为对外交有了这一层的理解和认识，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时认为，国家之间的外交活动并非一定先要由政府开始，而是可以由它们的人民群众建立沟通和交流，反过来推动政府间的外交关系发展。在这种外交思想下，新中国成立后便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指导方针。到了1970年代，随着国际环境获得改善，中国外交工作

的重点放在大力发展国家间的正式外交关系，中国领导人及时提出“官民并举”的方针，指出开展官方外交可以为民间外交提供更为有利的方便条件，同样，民间外交活动的力度不减，继续发挥其在国家友谊建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周恩来曾指出，民间外交活动的内容和形式要多种多样，应涵盖整个人民群众体系。他常说，“兵对兵，将对将”，各行各业要畅通，同行同业要有共同语言，所以工农青妇和各方面的专业人员都要重视对外工作。这实际上提出了中国开展“大外交”、“总体外交”的思想。

### 第二个时期（1978年—1989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历史时期。邓小平在1978年之后多次指出，中国的首要任务和最大的政治是搞经济建设，各项工作（包括外交工作）都要服务于建设这个中心。中国外交开始经历由“经济为外交服务”到“外交为经济服务”的转变。

这一时期，民间外交继续受到高度的重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认识到，如果国家之间的外交活动仅以政府作为主体，忽视人民群众在对外交往中的权利地位与作用，那么，国家彼此之间的感情与友谊是难以深厚、牢固的。邓小平提出要通过民间渠道对外开放，要借助并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类资源，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加快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随着这一时期整个世界格局与国际形势开始出现巨大变化，民间外交得到超越意识形态的积极发挥。在外交活动的基本要求与目标上，邓小平认为，中国不应该参加任何国际利益集团，而是与各国都建立外交往来。在考虑国际关系时，“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而要“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根据判断改革开放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但凡有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社会稳定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对象、形式和内容，都是中国外交活动的指向。



### 第三个时期（1990- 2008）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的任务都发生了新变化。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发扬并丰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外交思想，提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世界”等思想，既体现了中国外交与时俱进的创新性，又体现了新时期中国民间外交的思想不可分割的连续性。

进入 21 世纪，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外交强调贯彻“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指导方针。它意味着中国外交哲学从维护整体利益的国家中心主义到关切公民个体权益的转变。其宗旨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外交为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二是人民是外交的基石和后盾。它强调“主体参与性”，即在一个日益民主化和开放的世界里。建立公民利益表达和政策参与的常态机制，要求外交政策过程逐渐透明，是普通民众了解外交的基本运作和政策重点，真正成为外交工作的基础和后盾。

的确，外交在本质上不仅仅关乎各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关乎各国民众之间的关系、本国民众与本国政府的关系，以及本国政府与他国民众之间的关系。政府在名义上代表国家，但它实际上不等于国家。政治学定义的国家至少包括三个要素：土地、人民和政府。作为国家的固定组成部分，土地属于自然因素，并不参与国际关系活动；人民和政府则是构成国家的两个重要人文因素，是参与国际关系活动的重要行为体。

### 第四个时期（ 2009- ）

以 2008 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以及随后上海成功举办世博会）为契机，中国外交明确提出要加强与各个国家开展人文交流，从本质上增进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了解。党的十八大报告把人文交流放在战略高度，明确提出扎实推进对外人文沟通和交流。人文外交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作为民间外交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人文外交具有鲜明的中国

特色。它的基本思路与理念，乃是突出人的作用价值，并结合了文化外交与民间外交这两者的思想精髓。从外交主体上看，人文外交注重发挥社会的主动性和潜力，强调非官方的社会和民间力量的参与。从具体方式来看，人文外交所关注的内容涵盖与人民群众生活相关的各个领域，使当代中国外交具有广泛的性和普遍性。从外交目标来看，开展人文外交意在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中国更加融入世界。从外交理念来看，它既有中华文化的个性内涵，也包含“以人为本”的普世价值。

人文外交与“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一脉相通。如果说和谐世界理念在本质上是重视民间外交，那么，人文外交正是推动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所谓“以和邦国，以同百官，以谐万民”。万物和谐，贵在人和。和谐社会的核心乃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沟通。人类认同的最高层次是天下一家，这需要彼此相互分享共同的价值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文外交是为各国可能达成国际秩序与利益的新共识而提供的一个重要平台。

## 二

人文外交可以看作是一种制度化的沟通活动，是在获得国际公认的国与国以及它们的人民之间进行的。它通常包含三个层面的交流，即人员交流、思想交流和文化交流，其目的是促进国家之间人民的相互了解与认识，并创造出一定的公共产品并对其进行管理和分配。它与其他外交形式（如“民间外交”、“文化外交”、“公共外交”）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立足更为高远、更为广阔、更为包容，强调国际社会人与人、心灵与心灵之间的真诚沟通和交流，旨在创造一种和平、发展和合作的人类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文外交具有三个主要的特征。第一，人文外交从根本上讲乃是关乎沟通和交流活动。更为确切地讲，它是一种具有高度制度化的特定沟通形式。在沟通过程中，沟通者（譬如外交官和普通民众）通常遵循着并受制于一定的交往规则和规范。沟通和交

流的内容主要是思想产品和文化产品。一般地讲，外交倡导以沟通和对话（而不是以军事暴力）的方式解决冲突和敌意，但这并非说外交与军事之间没有关系，恰恰相反，一定的物质实力是对外交实践的一种保障，有备才能无患，即中国古人所谓“文事必有武备”。需要指出的是，外交并非总是天真纯洁的，譬如，对外宣战——如同斡旋和谈判一样——是一种高度制度化的人际沟通行为。为发动战争而以外交游说方式寻求建立多国联盟乃是另一个例子。

第二，人文外交使得更多的实体成为外交行为体成为可能。国家政体是外交舞台上获得公认的主要行为体。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只要关注国家政体就可以理解当今风云外交的全貌。一个国家驻外大使是显而易见的获得国际公认的外交行为体。一个国家的企业家、艺术家、作家或知识分子在海外从事工作和交流，他（她）同样是获得国际公认的、代表自己祖国的行为体。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快速变化，谁会得到国际公认也在发生着变化。这使得人们对参与外交活动行为体的界定不断呈现为开放状态。

第三，人文外交还是关乎创造、管理和分配一定的公共产品。也就是说，经由人文外交活动而创造并带来的公共产品（譬如分享的价值、共同的语言、集体的认同等）将给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社会带来福祉，社会中一部分人被惠及到这些公共产品，但这并不会妨碍社会的其他人也获得同样的惠及。传统上，外交一直被狭隘地看作是谋求实现、维护和拓展自身国家利益和好处的工具。不过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意识到，通过外交途径所获得的公共产品日益具有相互关联性，换句话说，全球化正在把一定的公共产品重新定义为全球的公共产品。一些传统上属于国家层面的关切（如环境、健康、和平、公正）正在变成为全球性的关切。这种转型使外交不再局限于为了实现本国国家利益，而是更多地着眼于解决和处理全球性、地区性问题，并考虑如何在全球及地区层面有效安排和分配外交实践所带来的收益。

人文外交涉及到人文与外交之间关系的问题。有人可能会问，人

文外交到底是侧重“人文”还是侧重“外交”？“人文”如何服务于“外交”、“外交”如何丰富其“人文”内涵？这些不仅是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急需回答的实践问题。现实地讲，外交关乎政治，关乎国家利益和权力。若过分强调外交的分量，过于急功近利地把人文交流视为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那么人文交流活动本身的意义可能受到伤害。理想地讲，践行人文外交需要有一种天下情怀，而不是停留在以国观国或者以国观天下的圈子里。践行人文外交需要有一种以化成天下的气魄，能够以潜移默化——或者说，不着痕迹——的方式把人文和外交两者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这乃是人文外交实践的一个很高境界。

中国积极倡导并践行人文外交，进一步表明它已经从过去典型的“小外交”发展为“大外交”（有时称“总体外交”）。建国初期，中国政府重视政党外交和民间外交，并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由于当时国内外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国外交活动高度集中，具有典型的“小外交”的特征，即政治家尤其少数职业外交家通过谈判、沟通和其他的和平方式达到实现、拓展、维护国家利益目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内社会及经济的巨大变化以及国际格局的重大调整，中国的外交概念也发生着巨大转变，从典型的“小外交”发展为“大外交”（即国家的政治家、政府部门、社会政治团体与组织、经济文化主体，甚至公民个人均参与从事涉外交往活动），给自身外交带上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 三

作为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外交是我国外交的重要开拓方向。近年来我国外交实践表明，人文外交已经成为我国外交工作新的增长点和着力点。一方面，它表明当今中国社会在融入世界的进程中不断呈现出自身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另一方面，它也表明，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日益延伸为人民与人民、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关系。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人文外交需要建立全方

位、立体化、多层次的工作格局，政府和民间力量共同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主导是必要的前提，公众参与是重要的特点，从而使人文外交能够在总体的战略下朝着统一目标迈进。

第一，如果说今天的人文外交是在尝试一种新的外交思路，那么，它需要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及哲学宝库中极为丰富的智慧和人文精神重新挖掘并表达出来，因为中国的人文外交必须从中国文化秉性、国家秉性出发加以考虑。中国人文外交的成长与发展，必须扎根于本国传统文化为主的土壤里。

第二，中国人文外交需要有自己的长远战略规划。就战略对象而言，它无疑是指对象国的广泛社会人群。这里有一个“我们该亲谁”的问题。譬如对于周边邻国，既要亲近海外华人华侨，也要亲近原住民，一些国家的掌权者乃是原住民。既要亲近对中国友好的外国人，也要亲近对中国不够友好的外国人。当然，搞人文外交不是一味的求友好，而是交往到一定程度就要提出我们的要求和原则。

就战略资源而言，它大体有三种人文资源来源，一是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二是中国科学社会文化资源，还有就是可供借鉴的西方现代文明资源。把这些资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可以形成我国丰富独特的人文资源。

就战略目标而言，它乃是推动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文明之间的平等沟通和对话，既促使世界能够更加真实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也寻求在参与构建未来和平与稳定的全球秩序的努力中，中国能够向世界提供来自中国的治理理念和人文价值。或者说，如果中国人文外交能够发展出一套新的外交理念、新的外交语言、新的外交原则和精神，那么，它将给未来的国际关系行为以及外交形态提供一些新的思想、原则及行动方式。

第三，中国人文外交的成功，依赖于不断推进其制度建设和能力提高。在人文外交的制度建设方面，一是加强部门协调，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外交体制来统筹各领域外交，以避免人文外交“政出多门”现象。二是注重顶层设计，可由最高决策机构来统筹人文外交的

目标和手段，尤其是科学统筹对有关人文资源的投放，避免人文外交实践过程中出现不同部门之间产生矛盾和不协调现象。三是思想开拓、进取创新。上层要管住，下层要放开。政府主要做顶层设计、资源分配；在人文外交的具体实施方面，更多鼓励民间机构、公司企业、大学团体等组织参与。

人文外交的能力提高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沟通能力的问题，涉及到拿什么东西与别人进行沟通、交流和对话。要挖掘和弘扬我国古代以及现代优秀的人文内涵。外国人对古代中国感兴趣，但对改革开放以来经历巨变和发展的中国也许更感兴趣。他们希望了解今天的中国是怎么样的，今天中国人的想法和梦想是什么，当代中国文化是什么。过去的东西也要讲，讲中国传统独特的、优秀的东西。如何把中国古代文明和当代文化的精髓挖掘并整理出来，并以人们可接受的沟通和交流方式呈现给这个世界，这便是增强中国人文外交能力的重要表现。当然，人文交流和沟通也要讲人类共同追求的东西。

另一个是表述能力的问题。它涉及到怎样讲和怎么讲好的问题。在人文交流过程中，要了解和认识国内外的文化传统，不做表面功夫，不讲大话、空话，而是真诚与对方进行心灵上的沟通。既讲中国特色和国情，更要讲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共性，讲分享的价值，讲人们其实都拥有相似的愿望和梦想。这样讲比较容易被人接受，所谓“人生乐在心相知”。换句话说，人文沟通和交流要抓住人心，以德服人，所谓精诚所致，金石为开。在更多的情况下，践行人文外交的主体，除了政府高层官员和职业外交官外，乃是由社会基层的普通民众以及由他们所组成的机构所充当的。大量的人文交流活动其实是在社会基层进行的。政治家和外交官出去讲话很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一个知名诗人或作家到国外去朗诵一段诗、讲述一段小说、或是一部中国电影在海外放映，这种表达方式可能更容易被国际观众所接受。

因此，如果说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许多优秀的东西，正是通过每个中国人的具体言行表现出来的，那么，整个社会——无论是政府、民间机构还是个人——都要增强自身中华民族人文精神和气质的培

育和修养，与此同时，还要具备了解和认识别国文化和文明的开阔视野，从而使中国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是促进对外人文交流和沟通的使者。

当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除了传承和弘扬自身中华文明之外，还需要学习和借鉴世界其他文明，促进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事实上，人文沟通和交流是一种双向的社会实践。它不仅向世界叙述着中国人文思想和观念，而且也在聆听他者对他国的文化叙述。此外，中国可以扶植和鼓励对象国（尤其第三世界国家）增强它们自身文化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帮助它们消除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留下的影响。与西方国家开展人文交流时，更需要有自信心和耐心，让它们能够逐渐消除西方文明占主导的传统意识。

## 第二章 人文外交的“中国特色”

### 一 中国人文外交的文化基础

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在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没有中断、延续发展的文明，迄今已有五千余年的历史传承。早在两千多年前，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真谛，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优秀理念，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这种独特而悠久的历史世界，让中国人具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中华文明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对绵延至今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科学态度，使之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作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继承古为今用的中国文化传统，弘扬源远流长的中华精神志气，这是我们在今天应该坚持和秉承的文化自信。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综合实力的逐步增强以及对外交往的日趋频繁，当代中国外交迎来了继往开来、开拓创新的新时期。与此同时，世界政治日益呈现出社会民众力量对国家之间关系施加重要影响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当代中国外交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机遇。作为总体外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文外交被提上当代中国外交的议事日程。

基于此，中国政府先后推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化治国理念。顺应这一时代背景，中国外交也不断推出新理念，接连打出新倡议。特别是2013年10月下旬，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



了我国周边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首次正式提出的中国周边外交四字理念，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精髓。

“亲”即亲缘纽带。《说文解字》曰：“亲，至也”，“父母者，情之最至者也”。亲的最初意思为父母双亲，是对跟自己有直接血缘关系的父母的至高之爱，是人类最原始、最朴素的道德情感。亲始于父母之爱，后又衍生到跟自己具有血缘关系或姻亲关系的亲族之爱，体现了一种血缘归属感和认同感，是用亲近和爱的方式表达的一种道德情感。亲还体现了一种普遍的德性原则，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亲亲之爱是爱的出发点，要在此基础上拓展延伸到家庭以外的人身上，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甚至还要能够惠及天地万物，达到一种“仁者，无不爱也”的境界。特别是在周边外交中，我们要注意发挥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的优势，努力做到“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诚”即真诚有信。《中庸》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的本意是“本来如此”，表示天地自然的规律客观存在。人的真诚则是“成己成物”，强调个人修养，只有将自己的本性发挥至极致，才能将其他物的本性发挥出来。在实践中强调诚的方法论意义，就不能不提到信。孔子十分重视信在治理国家中的积极作用，认为治国即使“去兵”、“去食”，也不能“去信”，理由是“民无信不立”。孔子还认为信是国与国之间相交的道义标准，“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诚信是个人安身立命之所，是结交朋友、进德修业之基，是治国安邦之道。崇尚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和传统美德。中华民族素来是讲诚信的民族，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只有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才能争取到更多朋友和伙伴；只有以诚待人，以信取人，付出真诚的努力和行动，才能赢得周边国家的尊重、信任和支持。

“惠”即互惠互利。在中国古代，惠主要指君主施恩于臣民，给予他们一定的好处，如此便可以动员或号召他们。在儒家看来，若实

施仁政，就需要做到“惠民、富民、教民”，其中惠民是第一步，“惠民”就是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古代的惠并不是单方面的，是需要施受双方共同维护的。儒家要求“君惠臣忠”，只有上下呼应，才可以协力实现太平。墨子主张“兼爱”、“互利”，也提出了“君不惠，臣不忠”。在这过程中，要充分体现人格和利益的平等。由于惠与利直接相关，因此在实施惠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利与义的关系。“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关于二者，儒家的总体原则是“义重于利”。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义以为上”，视义为崇高的道德价值。孟子认为要“贵义贱利”，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甚至要“舍生取义”来捍卫道德尊严。在外交实践中，惠就是惠及周边、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要注意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在考虑自己国家核心利益时，也不能忽略别国的利益诉求。坚持《大学》所言“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树立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如此才能收获更大的利益。

“容”即宽广包容。《说文解字》解释其为“盛”，徐铉注曰“盛受也”，《易经》认为“君子以容民蓄众”，《尚书》指出“有容，德乃大”。容具有盛受、接纳、容忍、包容之意，指的是对一切事物的尊重，尊重他们的存在和价值，不封闭，不狭隘，开放心胸，容许差异，在求同存异中实现和谐共处。所以，容具有双重性：一是对事物多样性的肯定与接受；二是对事物差异性的宽容与包容。在中国传统中，与“容”意涵相近的概念是“和”。《说文解字》曰“和，相应也”，中国古人将音乐的和谐作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天地等各种关系的模型。因此，对和的追求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遍理想。和之所以如此重要，因为它是生成万物的必要条件。西周史伯曾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不同的事物相互调和、融合才能生成繁盛的新事物。如果只是相同的事物重复叠加，则不可能产生新的质变，新事物便无从而来。在外交实践中，容意味着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大国胸怀。中华民族有着“海纳百川”的胸怀，历来主张和而不同、兼容并蓄。在践行容的过程中，

一要倡导包容，二要学会宽容。

这四字理念中，“亲”注重情感渊源，是基础；“诚”突出诚实守信，是态度；“惠”强调惠利道义，是目的；“容”彰显胸怀气度，是境界。这四字理念虽然各自侧重点不同，但在“仁”这一点上是可以实现统一的。仁的基本内涵是“仁者爱人”。不仅如此，“爱人者，人恒爱之”。仁体现了自我对他者的态度，是对他者关怀爱护的道德情感，是一种有机关联的责任和义务，具有不可分割的统一连贯性。仁深刻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性思维和交互性伦理，这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关联的、动态的、整体的人文文化。

关联性。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通常把各种事物视为关联性的存在，它们之间通常存在一种有机的联系。最有代表性的便是阴阳、五行。阴阳的本意是阳光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所以，山的南面为阳，山的背面为阴。古代思想家看到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就用阴阳来概括两种相互对立的或相互消长的方面，从而形成阴阳观念。但阴阳的观念并不止于此。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但这两方面可能是对立的，也可能是对等的、互补的。如男女虽然代表了阴阳的双方，但二者的关系却不一定是对立的，二者可以组成家庭，并养育后代。从这种意义上看，就是对等的、互补的。如一枚铜钱有正反两面，但是这两面作为不可分的一部分，共同组成了铜钱的两面。再以五行为例，它指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五行说认为宇宙自然是由这五种要素相生相克衍生变化所构成。随着这五种要素的盛衰，宇宙与大自然也会产生循环不已的变化。这五种元素是相生或相克的相互关联的关系，具体来讲，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在这个五行组成的关系网中，每种元素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依托其他的元素而产生作用变化，并进而给其他的元素带来影响。五行说反映了一种关联的、系统的理论。

动态性。最具代表性的命题当属《周易》的“生生之谓易”，它始终将宇宙视为一个生生不息的运动过程，一切都在流动变化之中，

任何事物都需要变化生生，这才是常道。《周易》中的“易”就是变化之意，《周易》全力强调变易的意义：“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曲要，唯变所适”。世界是不断变化、转化的，永不静止。对于这样一个变动不已的世界，我们不可能去订立死板的公式去对待它，一切必须随变化去适应。所以，事物不是常住不变的，变易是存在的基本方式，存在就是流动和变化。正是这种变易的哲学支持着中华文明不断与时俱进的发展，与时俱进就是适应变化、与变化俱发展。而变化不是没有内容的，变化的重要内容是“生生”。在宇宙的大化流行中，不断有新的东西生成，这才是变易的本质。换言之，宇宙不是死一般的寂静，而是充满着创造的活力，所以《系辞》中讲“天地之大德曰生”，“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因此，变化包含创新，永久的变易包含永远的创新，日新就是不断的创新，生生赋予了变易以更深刻的内涵，变易是生命的不断充实、成长、创新和展开，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精神。

整体性。《周易》中提出“三才之道”，即“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视天地人为一体，认为三者之间存在普遍的联系。这种整体思维的集中体现就是“天人合一”。这种思想在北宋儒者那儿已经非常普遍，“天地人只一道也，才通其一，则余皆通”，这就是强调天人合一、天人相通。天与人是直接统一的，如果说人不能认识这一点，那主要是由于人在天地自然面前降低了自己的地位。这种人与自然、天道的一致，表现了一种整体统一的智慧，在这种智慧中，天地万物共同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宋儒张载在《西铭》中进一步中指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就是“民胞物与”的思想。天地赋予了人的身体和本性，所有人都是天地生育的子女，万物都是天地所生。因此，人与人、人与万物、人与自然应该成为和谐共生的整体。天地万物都是在气的变化生生中构成的，天地就是我的父母，民众即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朋友，这就是儒家“万物一体”、“物我一体”的道理。宇宙中的所有一切都与

自己有直接的关系，这种以气媒介的高度关联性思维也论证了儒家尊老爱幼、抚育幼小的伦理，这都是个人对宇宙大家庭和自我小家庭的责任和义务。这种整体性的思维需要万物实现和谐发展、和平共处的生存方式。这就是“仁”的精神境界。仁是“万物一体”的至高的精神境界，天地万物都是与自己息息相通的。这种仁的一体境界不同于存在论上的万物一体观，而是指向一种悲悯的情怀，即亲亲、仁民、爱物，以此来实现人的社会义务。可见，追求万物一体的“仁”思想是宇宙关联性思维的最高的伦理体现，它既指出个人对于关联整体的义务，也指出了追求整体和谐是人的根本目标。

以上三点中，关联性强调合作共赢，动态性突出变化发展，整体性追求和谐与和平发展。这三者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共同体现了一种交互性的伦理规范，那就是人文精神，即对人的尊崇和关怀，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尚书·泰誓上》：“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意即天地是万物之父母，人是万物之灵。《老子》二十五章：“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把人和道、天、地并列，称之为四大之一。《礼记·礼运》：“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从天地、阴阳等角度肯定了人的崇高地位。历史上，中国虽然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学派和教派，但几乎都是将人本主义和人文关怀放在重要位置。以孔孟为首的儒家体现的是以仁义礼智为核心的人本主义情怀，它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和情操建设，主张“内圣外王”，依靠道德的教化来实现和谐、和平发展的大同世界；以老庄为首的道家注重“道法自然”，它所提出的“养生之道”、“返璞归真”、“清静自然”、“形神兼养”等都是对人的健康、生命和生活环境的关注和关怀；佛教思想虽然不是源于中国，但在中国经历了千余年的本土化和民族化发展，并对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佛家以慈悲为怀，主张个人修行，提倡“众生平等”、不杀生以及“因果说”等，劝导人们做善事有善报，这些都体现了对生命和个人的关怀。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启示我们：世间万物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联

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每一事物都是在与他者的关联中显现出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整个宇宙都应该建立起和谐共处、和平发展的关系。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维，中国外交提出了建设“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多次在重大场合阐述“命运共同体”理念。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顺应时代潮流，推动亚洲发展迈上新台阶。在2014年博鳌论坛上，李克强总理呼吁亚洲各国要构建融合发展的大格局，形成亚洲命运共同体。不仅如此，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指出，要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执政以来，先后提出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非共同体、中巴共同体、中印共同体、中拉共同体等一系列重要理念，向国际社会彰显了中国的态度和风度。

中国外交发端于博大精神的中华文明，落脚点是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观，为中国外交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当今世界面临的不仅是发展的困局，更折射出更深层次的思想危机。中国外交就是要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奉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推介治国理政的中国经验，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各种新挑战提供更多有益的公共产品。

## 二 中国人文外交的战略选择

由于缺乏对“人文外交”的统一理解，我国官方和学术界就人文外交的战略选择问题存在众多分歧乃至混乱。基于此，这里试图阐释人文外交的核心内涵，在此基础上，阐述我国人文外交基本的战略选择以及实现战略的基本途径。

### 人文外交的核心内涵

“人文外交”属于特殊的外交类型。和任何形式的外交一样，其主导权和执行权在政府手中，受政府控制、指导、监督和评估。它

可以借助许多种其他外交形式进行，比如官方外交、公众外交、政党外交、人民外交，等等。有鉴于此，人文外交的主导力量是政府，它确立战略目标、行动方案、实施策略和执行机制，而行动的主体则可以多种多样，包括政府自身、民间团体、企业和个人。

人文外交的核心含义是在政府的主导下，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彼此交流和传播各自的人文内涵，其核心是促进彼此文化中所包含的价值观的相互交流并达成相互理解。如果简约地定义人文外交的话，可以视之为由政府所主导的、指示或委托公共与私人主体所参与的、以促进不同文化及其所包含的价值观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交流的外交形式。

## 我国历史上人文外交的战略选择

我国人文外交自古有之。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一个中央帝国，我国与周边藩属国的交流基本上是以人文外交的形式展开的，属国不断学习我国的文化和制度，塑造本国的文化和制度。但在以朝贡制度为核心的外交关系中，中国并无兴趣学习属国的文化，因此基本上是单向度的人文交流。自明末清初以来，伴随西方传教士进入国内，我国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但中国统治者和民间大体将西方的器物或科技文化斥作“奇技淫巧”，以傲慢态度待之，因此当时中西人文交流并没有促进我国文化的更新和进化。直至鸦片战争爆发，我国统治者才意识到西方文化的可取之处。以“洋务运动”为滥觞，我国开始了全面学习西方器物文化的历程，并在“五四运动”之后，开始全面学习包括西方器物、制度和哲学在内的所有文化内涵，这股单向度学习西方文化的潮流自此经久不衰。从新中国成立始，尤其是“改革开放”始，我国逐步确立了向一切世界先进文化学习的方针，并加强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可以说，在朝贡时代，我国的人文外交是以接受属国学习中华文化为基本战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基本上以全面学习西方文化、贬抑中华文化为人文交流的宗旨；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便以加强中外人文交流，吸收世界上所有文化和文明成果为我所用为战略。

## 当前我国人文外交的战略选择

历史地看，每一时期我国人文外交的战略选择都是基于自身国力的发展和国际（世界）发展的形势而确立的。当今之世，我国经济力量位居全球第二，综合国力大增；同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均经济水平还较低，发展很不平衡；另外，在全球化背景下，当前世界上各种文化和文明日益交融的同时也存在冲突日益加剧的现象；西方文明处于鼎盛时代但开始产生众多问题。在这样的条件和背景下，我国应对人文外交做出符合自身条件和时代要求的战略选择。

### 1. 人文外交战略选择中不应有的理念

在进行人文外交的战略选择之前，需要明确指出当前我国官方和学术界所存在的一些具有误导性的思想。事实上，有些选择若成为战略目标，将对我国人文外交甚至国家发展带来危害。这些选择包括：

第一，认为人文外交的目标是推进我国的“软实力”。软实力是美国人在权力政治范畴内提出的一个概念，而在权力政治范畴内，权力竞争属于零和游戏，软实力竞争也不例外。若一国软实力提升，则其他国家在同一地域或领域内软实力会相对下降。若我国实施人文外交时总以提升软实力为矢的，将会招致对象国或相关国家的担忧和疑惧。因此提升我国软实力不应是人文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

第二，认为人文外交的目标是输出或扩张中国价值观。有些西方国家比较青睐此种外交形式，如德国和日本都曾明确提出过要实行价值观外交，欧盟（包括其不少成员国）和美国也将对外传播西方价值观作为其对外交流的重要目的。价值观外交就是与具有相同价值的国家结成紧密的关系甚至同盟，而对非西方国家（尤其是所谓“共产主义国家”）进行价值观渗透，实施“和平演变”。作为西方“和平演变”的受害国，我国自然不能把中国的价值全面渗透到别的国家去，搞中



国版本的“和平演变”。

第三，认为人文外交就是文化外交。较之文化外交，人文外交具有更为宏大的战略和行动方案，也需更为连贯的外交体制的支持，而文化外交的格局比较狭小，仅限于在具体的文化领域（如文学、艺术、习俗、教育等）开展相互交流，区别于经济外交或安全外交等。文化外交是着眼文化领域的外交，着重强调交流的具体内容；而人文外交着眼于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对话，实现文化和文明多样性，需要战略性规划。

## 2. 人文外交的战略目标

一是促进和逐步实现文明对话，消除既存的或潜在的文明冲突。当今世界，以伊斯兰文化为主体的阿拉伯世界和以基督教文化为主体的西方世界存在事实上的文明冲突，尤其是西方文明对非西方文明的主动进攻和排斥导致了当今世界的诸多地区动荡和政治危机。另外，其他各种文明之间也远未获得充分的相互了解和信任，也导致了诸多国家间冲突。在此背景下，通过人文外交，以和平与理性的方式，力促各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并实现各国人民心灵相通，从而消弭文明冲突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国家间冲突，为我国和世界争取更为和谐与和平的国际环境与世界潮流。

二是促进文明间相互交融和共同繁荣，实现文明的多样性。目前，西方文明在全球处于强势和霸权地位，西方世界也依然秉持着“西方中心论”观点。为了实现全球各种文化和文明相互繁荣，实现文明多样性，需要在全世界弘扬各种非西方文化和文明，因此，我国人文外交的一大重要任务是促进消除“西方文明中心论”，促进全球文明的多样性和平等地位，同时促进中华文化和文明的对外交流和传播，促进他国对我国制度与意志形态的理解和认同。

三是促进中华文明和现代文明的有机结合，促进中国现代文明的繁荣昌盛。人文外交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提升我国自身的文化和文明水平。通过与异质文化和文明的交流互鉴，博采众长，我国可以吸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和文明并为我所用，弘扬和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文

明，融合形成现代中国文化和文明，为中国的崛起提供博大深厚的智力和精神资源，为世界的文化和文明多元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四是促进东亚地区真正文明一体的东亚文明圈。纵观全球其它不同地区，大体都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或文明（如现代西方文明、现代阿拉伯文明等），构成了一个多元的全球文明群落。通过人文外交，我国应努力塑造一个以中华文化或文明为主体的，适应东亚悠久历史、传统价值和当代特征的东亚文化和文明圈，并奠定东亚地区真正一体化的基础。

### 3. 人文外交战略目标的层次性

由于不同国家在我国发展战略规划上的地位和重要性不同，另外外交目标也会因时而异，因此人文外交战略目标在实际交往过程会有远近之分、地域之别，这就是人文外交战略目标的层次性。从期限来看，它分为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从区域来讲，分为对西方的目标和对非西方的目标。这样共同构成了人文外交的八类目标（见表一）。

就近期目标而言，针对西方和针对非西方的目标是不一样的，针对西方内部也应有所区分。近期针对美国等和我国有很重要利害冲突关系的国家（主要是西方大国），应通过人文外交促进它们对我国客观公正的了解和理解；针对不存在重要冲突利害的西方国家，应以促进对我国客观公正了解、理解和初步尊重为目标；针对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而言，应以实现相互真正了解、理解与尊重为目标。

从长期的战略目标来看，针对西方主要大国（比如美国），应通过人文外交实现彼此国家和人民间的互相尊重和平等相待；针对没有利害或战略冲突的西方国家（比如新西兰、捷克等这类国家），应以实现彼此国家和人民间互相尊重和平等与友好相待为目标；对亚洲国家来说，我们的战略目标是实现共享的东亚人文内涵，促进亚洲文明的复兴和崛起；针对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应努力促进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文化独立和复兴，这也是消除“西方文明中心论”的重要战略步骤。

表一：我国人文外交战略目标的层次性

	西方		非西方	
	美国和主要西方大国	和我国无重要利害冲突的西方国家	亚洲 (主要是东亚)	非洲和拉美
近期	促进对我国客观公正的了解和理解	促进对我国客观公正的了解、理解和初步尊重	实现相互客观公正的了解、理解和尊重	实现相互客观公正的了解、理解和尊重
战略	实现彼此国家和国民之间真正平等相待	实现彼此国家和国民之间真正平等和友好相待	实现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明圈和亚洲文明的重新崛起	促进非西方的文化自觉和非西方文明的崛起

## 实现我国人文外交战略目标的途径

### 1. 实施人文外交的基本路径

首先，加强我国自身文化与异质文化的交流互鉴，努力吸收国外先进文化和文明成果；同时挖掘和弘扬具有我国特色的现代中国文化与文明。其次，帮助提高非西方的，尤其是东亚、印度、阿拉伯、拉美和非洲地区的文化与文明的国际地位，帮助它们挖掘自身的文化根源和独立性，促进这些地区独特文化与现代性的融合。第三，增加与西方国家的人文交流与互鉴，向西方世界持续介绍中国现代人文内涵。

### 2. 具体的途径和策略

第一，努力挖掘、明确、创立和宣扬我国自身的优秀人文内涵。目前重中之重是挖掘、整理和宣扬我国当代的人文内涵。从理论上说我国有三大人文资源可资利用：传统人文资源、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文资源、被我国吸收和认可的西方现代人文资源。这三大资源的有机结合可形成我国自身独特的人文内涵。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形成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主，实现当代中华文化和文明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奠定开展对外人文交流的深厚基础。

第二，祛除文化和文明中的“西方中心论”，促进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多元化。我国应在国际社会多宣传文明和谐论和文化多元论，反对文明冲突论和文化中心论，当然也要防止中华文化中心论和霸权论，在国际社会真正树立起文明多元共存的思想潮流。

同时，以大国身份承担起消除西方中心论，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发现和实现文化自立和精神独立的重任。同时与发展中国家一起，在西方推进人文交流，在西方世界传播和介绍非西方文化和文明（如举办展览、出版书籍、制作影视作品等），帮助西方世界获得多元文化的熏陶。

第三，构建和完善科学的人文外交机制。应在国家层面规划人文外交的目标和预期效果，并有强有力的部门执行人文外交的战略规划，还应有研究机构（可以与发展中国家一道）持续进行理论探索，提供不同地区实现文化独立的依据和途径，提供人文外交的各种策略等；也应与发展中国家一道，相互交流，加深理解，尝试建立起非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人文交流平台或多边机构。

第四，努力通过市场化和社会化途径推进人文交流。以公共外交和人民外交等为推手，促进中国人文外交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政府作为人文外交的幕后推手和总规划师，让民众、社会团体、教育机构和企业走在台前，依赖市场的、社会化的方式推进人文外交。

如果说西方工业化时代是驱除一切封建主义生产生活方式，建立全球范围内的民族国家体系的年代，那么在全球化的今天，历史正进入一个去除西方文明主导型的时代。当前的时代是实现全球范围内文明和文化多样性和平等地位，促进中国与非西方世界在经济和文化上共同和平崛起的时代。需要强调的是，我国提倡和平崛起时不应只围绕自身，而应提倡和非西方世界的众多新兴国家共同和平崛起，即中国和发展中世界共同的崛起。

恩格斯曾经说过，“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可以演奏第一小提琴”。然而，即使我国文化和文明历史悠久，影响深远，但从根本上使我国文化和文明在国际上产生真正重大的影响力，成功抵御西方文化和文明的侵蚀，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文化的独立性，促进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最主要还是依靠我国经济的大力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以及依靠我国在制度、文化、发展理论上的全面自信。如果没有上述方面的支撑，空谈人文外交，则人文外交的目的终究是镜花水月。因此，大力发展经济，进行制度创设，形成文化自觉和自信，是我国大力弘扬人文外交的最坚强动力。

### 三 中国人文外交的制度建设

中国人文外交的成功，还有赖于不断推进其制度与机制建设。

当前，我国开展中外人文交流对话机制的总协调和秘书处均放在教育部，由其负责具体的协调工作。教育部在进行协调时主要涉及到三对关系：首先，外交部和教育部的协调问题；其次，教育部跟人文交流机制框架内其他部委的协调问题。第三是教育部跟机制外的、涉及到人文外交的部委间的协调。例如宗教对外交流和宗教走出去，就涉及到国家宗教事务局。从中外人文对话机制的领导实施层面来看，我国的人文交流机制都是由刘延东副总理担任中方机制的主席。然而，外方的主席则存在较大区别。俄罗斯是副总理，美国是国务卿，欧盟是负责教育文化语言多样性和青年事务的委员，英国是文化大臣，法国是外交部长。因此，双方对应部门是存在不同。从成员单位来讲，中方机制的成员单位包括国务院办公厅、外交部、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文化部、卫计委、广电总局、体育总局、团中央以及对象国的驻外使团。总体来看，现有制度下，中国人文外交涉及到的部委非常多，而外交部在其中的角色与定位又不太明晰。一定程度上缺乏顶层设计、涉及部门庞杂、统筹协调困难这是当前中国人文外交所面临的最突出的制度难题，也是人文外交制度建设亟需突破的方向。

因此，加强人文外交制度建设，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着手：

第一，加强对人文外交工作的高层统筹和部门协调。人文外交的制度和机制创新是我国外交工作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重要一环。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国际形势下，中国要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外交体制来统筹和驾驭国家的外交工作。目前在许多具体外交领域，“政出多门”的现象非常普遍。由于行政体系的历史原因，导致外交部并不能够统领所有的外交和涉外工作。而各个部门则习惯从自身利益和工作惯性出发来设计和执行具体的外交项目。因此，要建设好中国人文外交的制度、机制，首要任务就是要把人文外交纳入国家总体外交的战略和布局加以设计和筹划，使其服务和服从于我国外交的总体目标和需要。同时，在机构设置上，应尽快建立由最高外交统筹机构来统筹人文外交开展的目标、手段和资源投放，协调各部委开展相关工作。

第二，注重人文外交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应明确人文外交在总体外交、具体国别外交和区域外交当中的定位和价值，有针对性地对特定国家、特定类型的人文外交采取不同的战略目标和不同的资源投放。总体来看，中国对外开展人文外交，通常有三种类型：

一是替代型。对那些战略对话存在分歧、经济对话矛盾重重的国家和地区，希望可以借助文化领域作为突破口，改善双边的紧张关系。中国对美国和对欧盟的人文外交即属于这一类型。由于战略经济对话阻力相对较大，双方妥协余地小，甚至还会产生某些冲突，因此需要从文化等“务虚”的主题进行突破。二是对接型。最典型的例子是法国，因为文化本身构成了法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也是法国国际影响力的主要来源，以及法国开展外交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手段。因此，在和法国交往的时候，文化成为情理之中的首选。而且中法在这方面有开创性的创造，例如文化年、语言年都是中法间率先创设的。三是辐射型。这种类型主要对象国是对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存在仰慕或者需求的国家，而且中国有能力向该国传播文化和价值观的“正能量”。例如中国佛教、传统道教和儒家思想在东南亚国家的深入影响等。

对于替代型外交活动，对其开展人文外交的作用是相对有限的，

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关系，人文外交的重要性远不如安全战略利益或者经济利益。对于对接型外交活动，人文外交所起的作用则是比较重要的，效果也是积极的。最后，对辐射型外交活动来说，我国实施人文外交的作用相对是比较大的。但是也需要经济外交加以配合和补充，否则作用有限。要客观认识和评估人文外交在针对对象国的总体外交战略和布局中的定位和价值，因地制宜。

另外，即便在对象国内部，我国也应区分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针对不同的群体，也应有相应的目标和手段。以中法人文外交为例，一个关键群体是法国的汉学家，因为他们对法国民众的对华态度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尤其是他们在媒体上的言论。因此，针对法国进行人文外交时需要针对这些法国汉学家的需求设计特别的活动和资源，定点开展工作。

第三，开拓参与人文外交的社会主体和多种力量。要实现人文外交制度建设的创新发展，需要解放思想、大胆开拓。上层要管住、下面要放开。换言之，政府的主要作用应是集中精力搞好顶层设计、处理资源分配。在具体实施层面，政府不应该“处处冲在台前”，而应该由社会力量，比如民间机构、大学、科研机构、文艺团体等组织来承担。因为，这些民间和社会组织更容易被国外民众接受，也符合国际惯例。如果政府的身影“无处不在”，可能会给国际公众造成中国人文外交是在输出意识形态、输出价值观甚至“文化侵略”的印象，在当前国际舆论总体上对华带有“有色眼镜”的大背景下，容易授人以柄，反而使外国公众对中国文化传播产生戒心和抵触，对人文外交的实践带来负面影响。我们应大力激发和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中外人文交流和沟通中的积极性，努力扩大社会主体的参与范围，培育提高社会主体的项目实施能力。政府可以设立专门的人文外交基金和基金会（而不是财政直接用拨款），以资助高校、民间组织、文化团体开展具体的人文外交项目。总之，在未来的中国人文外交实施机制中，政府的职责，主要是控制相关项目的审批和资源分配，进行宏观指导和规划，提供相应的政策和资源服务，不断减少微观干预；人文外交

项目的具体实施过程、实施对象和实施方式，由社会和民间力量充分发挥自主性去决定。

#### **四 中国人文外交的能力提高**

除了挖掘自身的文化基础，制定必要的战略规划，设计合理的制度外，中国人文外交还需要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提升中国人文外交能力，可以从理念、内容、方式三个层面加以展开。

##### **更新理念，避免误区**

人文外交能力的提升，不仅需要获得沟通交流的技巧，而且还要理解技巧背后的理念。

首先是人文外交主体的多样性，将外交的主体从官方扩展到普通民众。与传统的官方外交不同，官方人员和民间的普通民众、社会组织都是人文外交的主体，外交官在人文外交中只是牵线搭桥的作用，常常退居幕后。中国人文外交能力的提升需要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合力。市场、社会和政府，他们有着各自的优势和不足。社会是人文外交的直接推动者，他们拥有丰富的知识和活力去应对人文外交；市场具有资本优势和产业化的优势，企业可以为人文外交提供赞助，提供资金上的支持；企业可以利用自身的商业优势开发文化产品，扩大文化产品的影响力；国家手中掌握着法律和政策，它可以通过税收等政策杠杆调动企业和组织的积极性。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者之间分工明确合力搭建了“立体外交”。例如孔子学院在全球的推广主要动用的是政治和社会的力量，政府给与一定的经济支持，社会为孔子学院提供了大量的师资。在未来孔子学院的发展以及汉语推广中企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仍然有待加强。比如中国的海外企业在招聘中注明通过汉语水平考试的优先录取，这样汉语教育可以得到更大的推广。

其次，重视人文外交中文化交流的维度。人文外交内部存在着文化和外交间的张力，这种张力人文外交演化的内部动力。文化强调的



是长时段和非工具性，坚持的是某种价值理想；而狭义上的外交常常重视当下利益，将文化视为一种工具。当人文外交侧重外交时，文化就突出了“软实力”的一面，文化在外交中扮演着锦上添花的角色。但有时候文化和外交或者说软实力过多的结合在一起，这会伤害文化本身。比如在跨文化传播中，因为文化和外交走的太近，文化就会被当作宣传进而将其过滤，无法达到受众的面前。文化外交的理想维度是文化交流的维度，它旨在增进彼此的认识。此时文化是一种存在方式，每个国家在文化的交融和冲撞中不断深化对自身的认识，在交往中共同绘制人类未来的美好前景。所谓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人文和天下之间形成某种合力，寻找人文和文化的共通点，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提供智慧和路径。当人文外交以文化交流为主的观念后，我们就要调整对外部世界的想象，对外部世界心存合理的预期，用平和的心态去看到他者。这种平常心不需要直接赢得他者的赞同或者掌声，它不会认为别人和自己想的一样，也不会将别人改造的和自己一样，用平等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的邻居，看待世界中的“强者”和“弱者”。它不盲目崇拜强者，不要将外部的判断作为自己行为的标准。在文化交流者眼中，中国的自身定位不应该在经济总量世界第一还是第二，中国需要考虑的是中国对人类未来的发展做出贡献，中国要有某种国际主义情怀。文化交流是以“零存整取”的方式为国家间的“信任账户”增加储蓄，当国家间陷入僵局时这个账户常常扮演救急的角色。中国当前状态下，人文外交软实力的维度越来越受到重视，而文化交流的维度常常被忽视。提升人文外交的能力需要重视文化交流的维度。

第三，人文外交不是文化输出，而是文化的双向互通。每种文化都有它的特色和优势，人际交往中我们常常需要发现别人的优点而不是别人的缺点，人文外交也是如此。它首先需要寻找的国家间的“通”和“同”，而不是去寻找“不通”和“不同”。文化交流中避免陷入“比较”之中，品评文化的高低贵贱，而是抱着彼此欣赏的态度去看待他者的文化。19世纪的西方国家在崛起的过程中，常常用“文明”与

“野蛮”，“自由”和“专制”等带有明显价值判断的术语来评判非西方世界。21 世纪的今天，我们不可重蹈对他国进行文化输出的文化霸权主义。我们仍需要坚持人文外交中的互通、互鉴的原则，坚持一种基于理解的平等，不是简单地推己及人。我们可以基于自身经验以对话协商的语气同给某些国家必要的建议，我们也需要从他者身上发现并借鉴某些东西。

概言之，人文外交需要国家、市场、社会三股力量的合力，人文外交内部存在着文化交流和软实力间的张力，人文外交反对文化霸权，坚持一种平等和互鉴。

### **多样性和主体性：提升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创造能力**

人文外交的中心问题是将怎样的我传递给他者，同时我能从他者哪里获得什么。文化资源的挖掘就是为了发现“我”的不同面向，然后借助某种文化符号将我传递给他。文化是人文外交的根基，如果没有好的文化产品人文外交将是无本之木。因此提升人文外交能力首要的是提升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创造能力。我们之前的文化外交中常常打包成一个相对宽泛的“中华文化”，这种以面为单位的中华文化，在实际的传播过程中常常缺乏点对点的针对性。因为人文外交中受众的多样性，要提高人文外交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必须要有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例如外国人中有对中国思想经典感兴趣的知识精英，但普通民众可能对功夫更着迷。因此文化生产者们既要从传统经典中发现新的智慧，又要从当代的民众日常生活中获取灵感，搭建多层次文化生态，做到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并重。

文化生产者们需要有明确的主体意识，在开放交往中培育具有自身特色的话语体系。强调主体意识是文化生产者对自身文化的尊重，也是为了丰富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以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为例，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在研究时多是沿用西方的概念和话语体系，主体意识并不明显，常常是“以西解西”，缺少“以中解西”的视角。若构建中国式的区域国别研究，学者们需要从本土资源（传统文化和日常实

践)中获取解读西方的新视角和新概念,然后通过精细的研究形成一些研究成果。这些成果的不断积累,逐渐形成中国式的区域国别研究。强调主体意识并不是自大式的闭门造车,与之相反,它源于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源于不同文明间的相互对话。

简言之,人文外交能力的提升需要强化文化产品的多样性,突出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 **“能听会说”：提升沟通和讲述的能力**

人文外交的实践中,我们面临的直接问题是语言和沟通问题,即听和说的问题。中国的人文外交实践中常常缺少针对性,讲述者采用的语言和讲述的形式均存在着问题。我们既要善于表述,也要善于倾听。

提高民众的文化交往能力,首先需要学会“倾听”。倾听需要我们先懂对方的语言,理解对方话语中的隐含的含义。当我们想要让一个外国人了解中国时,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倾听他说话,在倾听中理解他的关切和需要,进而寻找与对方相通或者相连之处,在此基础上,与之展开深度沟通。如果一个人在交谈中透露出他们希望了解今天的中国是怎么样的,今天中国的思想和梦想是什么,当代中国文化是什么。这时,我们就不应该向对方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当对方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时,我们需要在这些文化作品的基础上用今天的语言通过沟通和交流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在践行人文外交活动时,要反复实践先听后说这一原则,每个个体的跨文化交往能力才会提升。这是点对点的人际交往中的原则。大众传播时,人文外交需要明确受众,借助观察和调查等手段理解受众的需求,进而选择合适的策略。

第二,人文外交需要大量地方性知识做支撑。当前中国人眼中的世界主要是西方人眼中的世界,对西方以外世界的知识缺少厚度。这导致我们在进入非西方的世界与之交往时常常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同对方打交道,以己度人,这样的交往带来的是更多的隔阂和误解,引发文化冲突。高校和智库需要加强区域国别研究,减少瞎子摸象式

的外交带来的不必要的分歧和隔阂。

第三，提高表达能力。表达能力主要涉及到谁来讲，如何讲的问题。过去，推广某种东西方面，我们常常是用内宣的方式去办外宣。提升表达能力需要从宣传走向叙事，学会以人们可接受的方式将中国故事讲述出来。人文交流活动的主体是社会基层的普通民众以及社会组织，他们在基层展开的文化交流活动其效果常常并不比外交官差。一个知名诗人或作家到国外去朗诵一段诗、讲述一段小说、或是一部中国电影在海外放映，这种表达方式可能更容易被国际观众所接受。人文外交的效果不仅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每个物品，每个中国人的具体言行在特定情境下常常成为文化的代表，成为外部世界认知这个世界的窗口。物品和个人的言行变成了无声的表达。

人文外交中的中国社会，包括政府、民间机构和个人都是其中的主体，人文外交让每个个体可以产生对国际社会的体验，每个个体在这其中不断地开拓国际视野将自身的东西融合进来。赢得别人的尊重不是因为财富，也不是因为武力的强大，尊重来自于心灵的连接。

### 第三章 国际经验与人文外交的当代实践

近年来，中国与一些欧美国家建立起了多种类型的人文交流机制，包括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及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这些交流机制的运行与实践，为我国未来开展广泛的人文外交和人文交流积累了经验。与此同时，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多年来开展文化外交、公共外交的经验，也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他山之石”。

#### 一 发达国家开展人文外交的经验

世界上许多国家非常重视文化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在文化外交理念及政策实践上各有不同，但它们的经验和教训可以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启示。目前学术界对美国及日本文化/公共外交的情况已有不少评介，这里将对美日文化/公共外交给予扼要叙述，而把更多篇幅放在对欧洲文化外交情况的评介。

#### 欧洲的文化外交

欧洲没有“人文外交”的具体提法，鉴于我国与欧盟、法国和英国分别建立了人文交流对话机制，因此还是沿用“人文外交”这一表述。欧洲主要国家现有的人文/文化外交体系，起步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化时代，针对国际文化关系的变化，欧洲各国的对外文化政策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与调整。这里选择德法英三国进行跨国别的比较，分析欧洲主要国家在人文外交的原则目标、实施主体、政策路径等方面的差异，探讨欧洲国家人文外交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 1、德法英人文/文化外交的概念

“人文外交”，在欧洲没有完全对应的提法，相近的概念是“文化外交”或“公共外交”。在德语实践中，常常表述为“文化外交”、“文化宣传”、“对外文化工作”或是“对外文化政策”。在英语中，对应“文化外交”，

法语对应“文化外交”或是“对外文化政策”。“文化外交”和“对外文化政策”是具有多重语义的概念，在欧洲国家的实践，主要表现为：鼓励双边或多边的文化交流，加强伙伴国国民对本国的认同、好感和理解。欧洲学者普遍有一种看法，认为欧洲的文化外交不同于美国的公共外交，虽然二者在宣传方式上具有相似性。相对而言，美国的公共外交目标更为明确，主要服务于军事和政治安全的目的。

文化外交基于双边或多边协定，具体执行或是通过政府机构，例如法国由外交部直属的文化、科学与技术关系总局（DGRCSST）总揽；或是经由所谓的中间组织，例如英国文化协会和德国的歌德学院。

在欧洲，文化外交传统上与民族国家密切相关。每一个民族国家，使用一种共同的语言，拥有共同的文化认同。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入，欧盟成员国的文化外交呈现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以在国际关系中塑造统一的欧洲认同为目标，与传统文化外交的民族国家原则有所冲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有关统一欧洲身份认同和共同价值的讨论逐渐增多。值得注意的是，中欧之间现有中欧、中法、中英人文交流对话机制，但是没有中德人文交流对话机制，这其中有德国对华政策欧洲化的因素，也受到德国文化外交自身特点的影响。

德法英三国对于文化概念的界定有所不同，这也直接影响到三国文化外交的政策路径。法国历史上是中央集权的政治生态，国家和社会利益高度中心化，主张政治权力和文化的统一。因此，法国对外文化政策的目的性很强，即向对象国输出法国的思想和文化。法国的文化外交具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和鲜明的单向性的特点。

反观德国，文化和政治两个概念具有一定的互斥性，这主要是基于十九世纪德国社会的政治生态。在建立现代意义的德意志国家之前，德国社会处于一种邦国的松散状态，所谓“德国”更多的是一种德意志文化国家的概念。因此，德语中“文化”概念的界定更多强调各种文化的自身价值及自我完善的潜力，不同文化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德国文化外交倾向于相对平等的双向文化交流，与法国有明显的

区别。

在英国，国家与文化在传统上没有自然的联系。英国文化外交的重点不是强调自身文化的优越性，而是倾向于相对务实的社会政策。

## 2、德法英人文 / 文化外交的特点

基于不同的文化概念、历史连续性和对外政策的特殊性，德法英三国在文化外交的原则目标、实施主体、政策内容和对象路径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从文化外交原则和目标上看，德法英三国均有自身不同特色。德国联邦政府在 1977 年发布了有关对外文化政策的第一份官方文件，文件的起草经历了长达七年的专家咨询过程。这份文件明确指出，对外文化政策是德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外政策的第三维度，服务于对外政策的长期目标。对外文化政策与对外经济政策同等重要，旨在确立德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的形象。以文化大国的身份争取尊重与认同，与战后德国的特殊地位和东西德长期分裂的状态有关。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的目标是推动欧洲一体化，巩固德国与北约和欧盟的联系，缓和东西方对峙，加强南北对话。在两德统一之前，文化作为和平交流与理解的工具，被用于解决外交难题，例如两个德国的共存问题。

文化在对外政策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是法国的传统。法国对外政策对文化外交有明确的界定。法国部长会议于 1983 年通过《法国对外文化计划》的指导方针，由外交部下属的文化、科学与技术关系总局（DGRCST）负责法国的对外文化政策，采用中心化的组织结构。相对于英德两国，法国的文化外交具有更多的官方特质。

法国的文化外交强调“辐射力”，即把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力量，通过宣扬法国的文化成就与价值，捍卫法国在世界上的声望和影响。法国文化外交的另外一个目的，是支持法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包括促进伙伴国国民对于法国文化产品的兴趣，为法国文化企业寻求合作伙伴等。

英国把文化关系作为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外交与联邦

事务部把文化外交视为“软实力”，将其作为经济、政治和军事之外的一种独立的力量，服务于对外关系。英国文化外交的主要任务，是向全球民众介绍英国的社会发展模式、价值与成就。

从文化外交政策实施主体上看，德法英三国在文化外交的组织结构上有所不同。法国的文化外交由外交部文化、科学与技术关系总局负责并直接参与实施，外交部负责制定对外文化政策的纲领和规划，由驻外文化机构实施，使馆进行监管。英德两国的实施主体是相对独立的中间组织，如歌德学院和英国文化协会。英国文化协会享有独立的地位，无需国家层面的协调，但是有义务遵循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的指导。德国的文化外交主要由歌德学院、德意志学术交流基金会、洪堡基金会等中间机构负责实施，一小部分由外交部承担。

从文化外交政策内容上看，德法英三国有着不同侧重之处。德国的文化外交没有界定具体的内容，主要通过不同的实施主体举办各种活动展现社会的多元性，向国外民众介绍一个与时代相适应的德国形象。德国的文化外交注重三个视角：1、诚实与自我批评：通过反映德国社会的意见多元性，多方位地展现社会生活，展示的内容不一定是积极的或完美的，而是力求真实；2、不寻求介绍一个整体的积极的德国形象。受到德国战后特殊地位的影响，德国在进行文化外交时，相对收敛，避免“输出德国价值理念”的印象；3、改善德国的国家形象，在国外重建信任。

与德国不同，法国强调法国文化的世界性地位，为本国文化产业提供支持。文化外交的内容包括展示法国昔日的文化成就、介绍当代艺术的发展等。借助设在海外的法国文化中心和法盟，确立法国作为世界文化载体和文化创造者的形象。

相对于德法，英国的文化外交与发展援助、技术合作结合紧密。文化外交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传播英国的自身价值和西方价值。

从文化外交的对象与路径上看，基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对外政策的特殊性，德法英三国在选择文化外交的对象国时，也有不同的侧重。一般地讲，文化外交应该注重区分不同的对象国。欧盟的文化外交根



据对象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价值观进行分类，制定有针对性的实施方案。

德国的文化外交在对象国的选择上，优先考虑西方盟友，通过文化外交加强与盟国的联系与信任；其次是加强与东欧国家的文化交流，促进东西方和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德国逐渐重视面向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外交。德国的文化外交遵循地区重心设置的原则，即选择有切实愿望进行文化交流的国家作为伙伴国。这一原则部分植根于德国战后的现实，担心对象国指责德国向外输出自己的文化。

德国的文化外交建立在交流、合作与相互性的原则之上，常常选择与国际组织进行合作的形式，例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盟、经合组织等机构进行多边合作。歌德学院在国外实施不同的项目计划时，也会通过寻求地方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文化与教育工作。

法国在国外的文化机构设置，首选法国具有传统影响的地区，例如西欧国家、马格里布国家或是在语言文化上密切相关的国家（法语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在寻求对象国合作伙伴方面，法国文化外交的首要任务是在国外传播法国语言和文化。相对而言，德国注重宣传文化的多样性，法国强调统一的整体形象。外交部文化、科学与技术关系总局负责协调法国在海外的所有文化行动。

英国文化协会的地理策略遵循英国在伙伴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侧重于英联邦和前殖民地国家，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设置了大量的文化机构。在欧洲一体化的背景下，英国同样重视与欧盟国家的合作；此外是经济增长较快，对英语、英国机构和产品有较强需求的国家。英国文化外交的最大优势在于，英语是全球使用最广的语言，大部分国家都有意愿与英国进行语言合作。

### 3、德法英三国文化外交的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对德、法、英三国文化外交政策实践的观察和分析，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以下几点启发：

第一、实施主体多元化：人文外交基于双边或多边协定，由政府统筹，具体执行可以通过政府，也可以委托给相对独立的中间组织负

责实施。为了便于对象国民众接受，在对象国开展人文交流活动时，可以考虑寻找当地的合作伙伴共同开展活动，或是利用国际组织的合作框架，采用委托任务的方式进行，避免单向文化输出的刻板印象，有利于对象国民众对于我国文化的接受与认同。

第二、双向平等的原则：人文外交应该指向相对平等的、双向的文化交流，而非单向的文化辐射。基于本土的文化交流是文化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文化外交有一个原则，即对外文化政策始于本土。文化外交不仅要在国外展示我国的文化，还应向伙伴国提供在我国进行文化展示的机会。德法英三国均设有相关机构，负责异域文化在本土的展示。在文化外交的实施路径上，我国可以考虑帮助对象国在我国进行文化展示，彰显双向交流的诚意。

第三、文化外交内容多元化：人文外交应具有自我批判的意识，通过展示社会文化的多元性，力求展示一个真实的国家形象，而非包装后的国家形象。在这方面，德国有些做法值得参考和借鉴。德国文化外交的目标指向清晰，即谋求在国际上重建信任，改善德国的国家形象。但是在内容设置方面，德国的文化外交强调诚实和自我批评的姿态，不寻求介绍一个整体的积极的德国形象，而是通过展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反映德国社会的意见多元。我国在文化外交的内容设置方面，也可以考虑多元化、多角度、多层次，向国外民众展示一个真实的、全方位的、不断发展的中国社会。

第四、针对不同对象国制定相应的政策：对不同的对象国进行分类，根据文化的血缘关系、相近性和差异性，有针对性地制定我国人文外交的政策重心和实施路径。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外国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相对狭窄，可以采用国际广播、信息活动和教育文化活动等传统的文化外交路径，适当结合发展援助和技术合作；对于发达经济体，民众可以通过网络、媒体和卫星电视等非官方主导的多种信息渠道了解中国，在这些地区，文化外交应侧重汉语的推广，以文化产业为载体，促进中华思想、知识与文化在全球的传播，在国际议题上彰显中国的声音。

全球化时代，超越国界的人员、信息和货物流动急剧增加，信息资源极大丰富，国民之间的接触与交往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文化外交的传统路径面临挑战。综合德法英三国近期对文化外交既有体系的反思与改革，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文化外交的政策目标如何适应新的时代：文化外交的既有体系，初衷是民族国家的文化宣传。随着媒体、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的发展，官方主导的信息传播路径不再是对象国民众获取信息资源的唯一渠道，文化外交的传统任务面临调整。文化外交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不再是通过政府机构或任务实施主体去传播文化，而是帮助外国民众克服接触既有丰富信息的障碍。具体来说，有两个可能的方向：一、加强汉语在全球的推广，把需要推介传播的重要信息译为外语，并向外国质询者提供进一步的阐释；二、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升外国民众对于我国文化产品的兴趣。

文化外交是否有助于消除偏见：欧洲学者的研究表明，人们对于某一国家或民族的偏见往往是出于自身的需要，因此，刻板成见很难被文化外交所提供的“客观”信息所取代。针对这一问题，德国近年来调整文化外交的政策路径，目标设置不再是“教授”或“学习”，而是“做”或“使之成为可能”。具体在实践中，就是使对象国民众超越国界获取信息成为可能。在教育文化交流活动中，奖学金的发放不再按照国家配额，而是取决于申请人能否成为两国民众交流的重要联络人。语言课程不仅由歌德学院等德国驻外机构承担，同时向对象国的本土语言培训机构提供信息支持和师资培训。在实施具体项目时，注重网络化和持续性，文化外交的重心不再是国家的自我展示，而是为民众提供基础设施，鼓励民间团体进行交往。

文化外交的实施主体需要一个清晰和连贯的架构：德国的文化外交在机构设置上，采用政府和民间载体的混合形式。法国近几年对文化外交实行全面改革，明确文化外交是一场关涉软实力和未来国际话语权的斗争。在文化外交的实施主体方面，尝试构建一个更加清晰和连贯的结构。法国议会在 2010 年通过相关法律，在法国驻外使馆文

化处的基础上加以拓展，设立法国文化中心，作为法国文化外交在全球的新标识。该机构作为公共事业机构，隶属于法国外交与欧洲事务部，未来法国文化外交的各种实践均纳入这一统一的名称和框架。法国文化中心负责协调不同行为体之间的联系，中心领导机构包括文化部、大型文化机构、地方政府、文化产业等行为主体的代表。法国文化中心巴黎总部和位于国外的各中心通过稳定与持续的合作，对文化外交的活动内容、人员配置和经费问题进行共同规划。建立统一的金字塔式的文化外交架构，有助于整合资源，保持政策内容的连续性，在重大的全球性议题上体现我国的声音。

## 美国的公共外交

美国对公共外交的一般看法是，公共外交是美国政府的一种能力，可以和世界各国政府进行互动，不仅是和政府，也和各国人民进行互动，它是美国政府向全世界沟通的一种途径。它不是单向的，而是双边及多边的对话。一方面，通过公共外交途径，美国向国外人民阐释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传统，以及美国所关心的事情。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机会，美国可以通过国外公众了解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对美国的价值观和行动有什么看法。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公共外交涉及三个层次。一是知晓，知晓本国自身的历史、文化、政策，包括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二是影响，以对象国能够接受的方式向其输出美国的体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三是了解，了解对象国的历史和文化、政策、思想、思维，以及所奉行价值观背后的历史根基和现实根基。

公共外交对美国政府来说是最高优先项目之一，美国政府也提供很多资金用来支持本国的国际公共外交活动。美国在公共外交方面有一些突出的实践，像“富布赖特”项目以及志愿者“和平队”。每年美国进行上千次的教育和专业方面的交流，也举办很多文化活动，有舞蹈团演出、美术展览，还有很多演讲者来到中国和其他国家介绍美国的一些情况，旨在有助于促进美国和其他国家在文化上的进一步沟

通了解。除了教育、文化和艺术等方面外，公共外交还包括许多体育外交项目，能够让人民聚在一起进行交谈，更好地了解各自的文化。美国人认为，在了解其他国家人民文化的同时，也是在给其他人民了解美国文化的机会。

一个主要的教训是，美国在推行公共外交的过程中，往往把文化作为施展权力政治的工具。公共外交的目的，与其说是文化沟通和交流，还不如说是输出西方的“民主自由”价值观，旨在改变对象国人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使你服从我的想法并遵循我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文化强势主义，它往往会引起对象国对其输入文化的抵制和反对。另一个教训是，冷战结束后不久，一度出现美国政府和国会淡化文化在美国对外政策中作用的趋势，譬如，解散美国新闻署并削减对外文化交流的联邦预算。它为冷战后出现全球反美主义浪潮以及美国外交在中东地区陷入复杂困境提供了部分的解释。

## 日本的公共外交

与欧、美类似，我国的近邻日本，在战后经济快速复兴的过程中，也高度重视对外文化外交。

1960年代起，为谋求区域大国乃至世界大国的国际地位目标，日本试图通过文化资源的活用，来改善和提升因二战而一度受到贬损的国家形象。其基本的理念是，通过综合而有效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来加深各国对日本的理解，增进国际间的相互理解，在文化及其他领域中为世界作出贡献，以此来创造一个良好国际环境并进而为维护和发展日本和谐的对外关系做出贡献。从日本的实践看，它主要在文化外交中采取了以下几个行之有效的举措。

一是设立政府指导下的专门民间机构实施文化外交项目。1972年10月，日本设立了由外务省管辖的特殊法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2003年改为独立行政法人，但基本性质不变。以国际交流基金为主体，日本展开了国际文化艺术交流（重点是推广日本的文化艺术），大规模推动海外日语教育，并在各国设立了日本文化中心。1974年，

日本成立了另一个相关的机构是国际协力机构。它目前的性质也是独立行政法人，受外务省管辖。与国际交流基金不同，该机构设立时主要是配合日本的 ODA 援助，即具体派遣人员到当地实施援助政策，然后对受援国在农林水产、医疗卫生等领域进行技术指导，同时接受受援国相关人员的技术培训。该机构的官方色彩是比较浓厚的。但是它同时还建立了一个志愿者组织，即“青年海外协力队”。主要活动是招聘 20~39 岁受过一定教育、具有一定技术的人员。后来日本为了要发挥年长的技术人员的优势，又专门建立了“高级海外协力队”。这些人通过自己的实际行为，在海外树立受人爱戴的日本人形象，借此提升整个日本国家形象。

二是高度重视推动海外的日语教育。日本很早就开始着力进行所谓的“语言外交”。其主要形式包括：在全世界举办日语能力的考试，撰写日语相关的教材，在海外举办日语讲座，派遣日语教学专家，并邀请海外教日语的教师或者海外的公务员到日本来进行研修。比较经典的例子是大平正芳担任日本首相时，曾于 1981~1984 年在北京语言学院推广全中国大学范围的日语教师的培训。由于当时大学的日语教师绝大部分是工农兵学员出身的，基本上没有去过日本，教材也十分老旧，因此日本投资的北京语言大学培训点的效果非常明显，上述人群经过培训后加深了对日本的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培植了一大批懂日语、对日本怀有好感的知识分子。

通过四十多年的长期经营，日本的文化外交应该说达到了比较不错的效果。但是，日本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其国际胸怀和视野还是比较狭窄。日本的着力点主要在于向外推介日本文化，多少还是让人感到了文化输出的意味。事实上，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人群对日本以先进国家自居的姿态比较反感。这一点值得我们引以为戒。中国大力展开人文外交时，一定要有国际主义的胸怀和宏大眼光，应以平等的态度与各国相待，不要急功近利，只注重一时一事的短期效应，而应放眼长远，加深中外及不同文明的相互理解与交流。

## 二 中外人文交流机制的现状与展望

目前，中国已分别与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欧盟建立了人文交流机制。这些机制的运作是我国人文外交的重要实践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机制的名称是有所区别的，体现了不同机制所蕴含的不同内涵和方式。中俄的交流机制称作“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中美之间是“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中欧是“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中英、中法则是“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早在2000年12月，中国便和俄罗斯建立了人文交流合作机制，即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之后，该委员会逐步扩展为了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至今年已举行15次会议。这是我国建立最早的、级别最高的、而且已经常态化的人文外交机制。该委员会最初只涉及四个领域，即教育、文化、卫生、体育。至今已经扩展到八个领域。

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起步于2010年，即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同时开始举办第一次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中美现在共进行了五轮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轮流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并和战略与经济对话同时举行。因此，相比分开举行的中欧、中英和中法人文对话，中美人文外交与整体外交的整合效果相对比较好。中美涉及六个领域，教育、文化、科技、体育、妇女和青年。

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则是2012年才建立。它跟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是同时建立的。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到现在为止两年举行一次，其领域主要是教育、科技、文化、媒体、青年。今年的会议新增加了妇女领域，扩展到了六个领域。中英的领域和中欧略有区别，是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媒体、青年。

中法的情况比较特殊，中法文化外交、人文外交已开展多年，且一直运作得比较成功，但是直到今年9月刘延东副总理访法才正式启动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中法人文交流机制包括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媒体和旅游七个领域。

下面通过具体分析中美人文交流机制这一典型案例，对我国如何更好地利用中外人文交流机制开展人文外交提出若干建议。

2010 年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建立之后，中美之间人文交流活动取得了长足进展。

从人文交流磋商机制本身来看：第一轮磋商的核心成果体现为 4 大领域，13 项成果。第二轮磋商将妇女、青年交流纳入中美人文交流机制，拓展了交流领域并达成了 41 项成果，第三轮磋商确定了数十项合作项目，双方达成共识将共同推动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实现机制化和可持续发展。第四轮磋商共计达成 75 项具体成果，教育领域新设了“中美百所高校一万名学生学者交流”等项目，并拓展了儿童早期发展这一新的方向。第五轮磋商共达成 104 项具体成果，创新的机制成果包括中方成立中美人文交流基金等。中美人文外交的机制化和可持续发展，不仅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战略意图的再确认”，而且也提供了“战略行动基础的再确认”。

从中美人文外交的实践看，实质性与多元化的交流成果日益显现。中美互派留学生数量显著增长——2010/2011 学年，中国在美留学生人数为 15.7 万人，到 2012/2013 学年，中国在美留学生人数达 23.6 万人。美国来华留学生在 2011/2012 学年仅约为 1.5 万人，至 2014 年，约 9.2 万名美国青年通过“十万强”计划来到中国留学。美国是全世界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最多的国家——共有 100 所孔子学院和 366 个孔子课堂，注册学生已达 20 万人。人文外交领域双方私营部门的合作得到特别加强——美国高盛集团赞助并主办了“中美音乐家音乐沙龙招待会”；印第安那波利斯儿童博物馆于 2014 年举办了“带我去中国”系列活动，向美国少年儿童展示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

当然，中美人文交流也存在诸多不足，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例如，推进人文交流的理念不够完善，还局限于精英化的模式；政策一致性和协调落实问题亟待解决，对人文外交的收效影响较大；具体执行方式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着眼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更好地与政治关系和经贸关系相配合，作为中美关系三大支柱的人文外交今后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



上改进。

第一，更新理念。目前中美人文交流更多由政府主导、由精英聚焦。无论是教育领域的美国“十万强”还是中国的“三个一万”奖学金，文化领域的“青年领导者交流计划”，还是科技领域的“中美青年科技论坛”、妇女领域的“中美妇女领导者交流对话会”，尽管可能其话题是涉及草根人民的，但其参与者根本上还是属于精英阶层的，同时也是政府发起组织的。理念的更新需要关注并推动社会基层或民间去做，抓住人文外交的本意，使之真正成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坚实基础。

第二，完善机制。可考虑设立中美人文外交领导小组（委员会）或中美人文外交秘书处之类的常设机制，负责协调涉中美人文外交的各政府部门、各级政府机构、各企业、各民间力量、各高校研究机构等。

可以考虑建立中美人文外交的双层次公私伙伴关系结构。第一个层次为制定层次，其核心构成是驻美使领馆、在美经营企业和在美个人、国内高校与智库、相关部委及中美人文外交领导小组（委员会）或秘书处。由驻美使领馆、在美经营企业和个人、高校智库等发现问题，智库界定问题并提出初步政策应对方案，高校负责进行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并提出合理化政策应对方案，相关部委、领导小组（委员会）或秘书处负责决策。第二个层次是执行层次，首先由领导小组（委员会）或秘书处设计并分解任务到各部委、各省市。然后再由各部委、各省市具体设计执行框架，将尽可能多的行为体纳入执行框架，特别是尽可能地实现各类任务的社会化和市场化运作，引入高校、智库和使馆的跟踪与质量评估体系，并结合在美企业、个人及当地反响，形成下一轮决策或决策修改的依据。如此形成一种循环结构。

第三，转变思路。建立由政府搭台、民间唱戏的大平台。人文外交的性质决定了人民参与其中的重要性，政府更大的作用应该是指导人文外交，而不是亲自办人文外交。在搭好中美人文外交的大舞台之后，政府需要深入思考如何建立民间力量上台唱戏的机制，其中包括

如何引入民间力量、如何评估民间力量的表现、如何建立民间力量的退出机制等。在这里，高校智库的作用相当重要，高校智库不只是一是要参与决策、提供政策建议，还要从外围建立各种评估体系或标准体系，使政府人文外交的执行有大量的可供参考的评估标准或体系。

第四，建立中美人文外交的危机预防与危机管理机制。人文外交中的危机预防与危机管理同政治、经济等外交中的危机预防与危机管理存在重大不同。前者所产生的影响远比后者所带来的影响面更广、持续时间更长。因此，中美人文外交的危机预防与危机管理需要同时兼顾以下三个方面：

(1) 建立早期预警体系。高校智库可考虑设立一整套早期预警的指标体系，监测中美人文外交中的民意民情变化趋势（可配套建设在美的对中美关系的定期民意调查机制），并及时根据现实情况加以修正；为执行早期预警，使馆、在美企业与人员、各部委等需要在执行过程中围绕早期预警的指标体系收集各类信息，使早期预警体系得以有效运转。

(2) 建立危机预防与危机应对机制。其核心是提升中美人文外交中对危机预防及一旦危机发生后阻止其升级的能力。它需要更多地从具有柔性的人文角度去考虑，而不是从相对硬质的政治或经济角度考虑。

(3) 建立一种上游预防能力。它旨在能够从根源上消除或缓解中美人文外交中的潜在危机，增进中美两国社会的相互理解，促进双方战略互信。这种能力建设更为长期，见效最慢，但最值得去做。

第五， 人才队伍建设。目前中美人文交流的人才主要来自政府部门。既要培养和训练人文外交领域的职业外交官，也可考虑加大引入企业人员、高校智库人员乃至民间组织人员参与人文交流的力度。要在人才队伍中形成一种多层结构。既在宏观决策或执行层次上建立齐整的公私伙伴关系，也需要在具体项目上建立起公私伙伴关系，使得人文交流的决策、执行、评估等过程充分考虑到各方面关切，收到最佳效果。考虑到当前国内用人机制的问题，特别是旋转门制度尚未

完全建立，这种公私伙伴关系结构可采用一种社会化或市场化方式运作，而非一定要将所有参与人员都纳入“体制内”。

### 三 中韩人文交流展望：从历史学出发

近年来，在中韩两国的外交中出现了令人可喜的新变化，而这些变化所围绕的一个中心，可以说就是“人文外交”的理念。首先是韩国的朴槿惠团队提出，以“人文纽带”作为发展与中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意识形态和理论基础。2013年朴槿惠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就加强人文交流达成重要共识，两国计划将人员交流从目前的每年700万人次提升到2015年的1000万人次。同时，两国领导人就加强两国“人文纽带”，成立“中韩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达成重要共识，同年11月，双方在首尔召开了“中韩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韩“人文纽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推动两国以互信的新思维来处理未来中韩关系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而聚焦“人文”，成为双方对发展和推进两国关系的共同认知。

2014年7月3日，习近平主席访韩期间同朴槿惠举行会谈时，又商定共同努力将“中韩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机制打造成为加强两国人文纽带的重要平台。两国元首还同意对外发布《2014年中韩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交流合作项目名录》，并积极推动落实。名录包括：青年交流、青少年交流、青年职业能力开发与创业交流、中学生交流、大学生交流、政府互换奖学金、教师交流、国际音乐考古学术会议、民间艺术创作人才交流、优秀作品交流、人文学论坛、人文交流政策论坛、传统艺术体验学校、陕西西安—庆尚北道庆州人文交流主题省市、传统服饰研讨会、儒学交流大会、变脸—假面舞互访演出及体验、苏州—全州人文遗产交流、地方政府交流研讨会等两国人文领域共19个交流合作项目。显然，这19个项目都是双方认为属于人文交流的范畴之内的内容。由此，我们亦可发现一个问题，人文的外延极其广泛，但其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目前看来，似乎并没有特别的聚焦。

笼而统之，人文外交最核心的问题应该可以概括为人与人的交

流，而人与人的交流表面上是人与人的交往和互动，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人与人的相互理解和信任。要达到相互理解和信任，当下的、现实的交往只是一个方面，而对过去历史和文化的共同认知则是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韩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交流合作项目名录》中，虽然基本上对这两个方面都有兼顾，但似乎还是更偏重于现实的人员往来交流，在历史和文化问题的涉及方面似乎并没有体现深层的思考。

作为一个中韩关系史的研究者，笔者拟从历史学专业角度来谈谈中韩人文外交有关的一些问题，总的来说，在研究过程中我深深感到，中韩之间的人文学术交流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可拓展空间，别的领域我不敢肯定，但至少从历史学角度来说是这样。

### 如何呈现中韩共同历史记忆：以“万历朝鲜战争”纪录片为例

历史学研究对于人文外交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在于达到一种共情的状态，即通过呈现相似的或共同的历史记忆达到现实中的情感共鸣。

以习近平主席访韩过程中的一个事件为例。习主席在首尔大学的演讲中，提到了万历朝鲜战争（壬辰倭乱）的一段历史，那是一段发生在十六世纪末的中韩共同对抗日本侵略的历史，而在习主席访韩的同时，央视与韩国两家电视台签订了合作拍摄纪录片《万历朝鲜战争》协议，这是习主席访韩这一外交事件中带出来的一个和历史相关的问题。习主席在当前东亚复杂政治形势下重提万历朝鲜战争，以及中韩合拍相关主题纪录片的决定，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背后的政治深意，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人文外交的大背景。现在万历朝鲜战争的纪录片正在拍摄之中，如何借助这个契机，切实起到加深中韩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互信的作用，达到一种共情的效果，是真正应有的考量。然而，要拍摄这样一部纪录片，如果没有人文学术研究的配合和参与，基本上只能流于表面，很难真正达到共情的效果。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关于万历朝鲜战争的历史研究，在中国历

史学界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的。问题之一是研究的关注点过于片面，过于强调助韩抗日这一面向，以及过于强调军事和政治的因素，相应的，韩国学者（以及日本学者）的研究都已经比中国学者更精细化，更多地触及社会和文化的因素。问题之二在于研究资料的不足，事实上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关于这一次战争的记录极其有限，更多的细节性史料其实都在朝鲜半岛保留了下来。因此，如果只用中国方面的资料，只以中国过去的研究成果来呈现这一段历史，拍出来的纪录片恐怕不会有多少人感兴趣，其文化外交的效用也不会很高，只是为了完成一项政治任务而急就章地拍出一部纪录片，不仅不能起到人文外交的期望达到两国人民共情的效果，反而还可能因为韩方、或者是日方学者的诟病，而起到负面的影响。

那么，应该怎么做才能呈现一个中韩共同视野下的“万历朝鲜战争”呢？我觉得这里面首先就是一个人文学术交流的问题。要把万历朝鲜战争的历史搞清楚，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工作必须开展。一是韩国学者（日本学者）研究的引介，韩国学者关于壬辰倭乱的专著、论文非常多，而历来中国学者了解很不足，这些研究和中国学者的研究无论从视角、史料、方法上，都有很大的互补性。二是韩国文献资料的发掘和整理。文献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前提，关于万历朝鲜战争的史料，韩国保存的资料数十倍于中国，虽然已经有些中国学者开始注意到这些史料，但至今没有系统的整理和引入，我认为完全可以做这样一个工作，那就是“韩国所藏万历朝鲜战争史料集”的编纂和出版。三是相关学术会议的召开。相比于研究的翻译介绍和资料集的整理出版，更迅速有效的办法就是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学术交流的过程中将国际学界（主要是中日韩三国）关于万历朝鲜战争的最前沿成果汇集起来，如果纪录片能够呈现这些最前沿的研究成果，而且能够同时客观地体现中日韩三方立场，这样的纪录片才真正有其价值。

万历朝鲜战争纪录片的拍摄，应该定位在以呈现战争的形式达到和平和“非战”的价值引领，这才是这一现实的文化举措理应追求的终极目标，才是体现中国大国胸怀的根本所在。

## 中韩历史学界交流的现状：问题和应对

万历朝鲜战争历史的研究，恰好折射出了目前中韩两国历史学领域的人文学术交流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学术交流的明显薄弱。相对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学术交流情况而言，中韩两国历史学界的交流极少，甚至基本上可以说是还处于一种彼此知之甚少的状态，这与中韩两国的关系现状极为不符。当然，这一方面与中韩建交只有短短二十几年有一定的关系，建交之前两国学界几乎隔绝，既没有相互了解的渠道，也没有相互了解的愿望。但是，建交以来的二十年，学界交流的步伐似乎还是有些过于缓慢。现在中韩两国的历史学者，似乎有些互相看不上对方研究的感觉，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国、中国学界对日本学界、欧美学界的研究都很重视，学术交流也频繁和深入地多。事实上，中韩历史学者的互相观感，完全是因为不了解而形成的误解，而这必须通过切实开展交流才能解决。因此，中韩之间历史学领域的学术交流亟待加强，而中韩之间历史学术交流的加强，某种程度上也对消解近代以来日本学界、欧美学界在史学领域的笼罩性影响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是学术成果和学术资料引介相当不足。这和学术交流的薄弱是互为因果的。韩国翻译出版中国方面的历史研究著作，以台湾学者的著作居多，这是因为中韩建交以前，大量韩国人到台湾留学，进而熟悉了台湾学者的研究。大陆学者的著述，韩国翻译出版的一直很少，近几年情况才开始有所改观，大陆学者的历史研究著作被译成韩语的慢慢多了起来。但是，回过头来看中国的情况，我们翻译出版韩国学者的历史学研究著作，实在可以用凤毛麟角来形容。事实上，韩国学者有大量优秀的研究是值得中国历史学者借鉴的，问题是我们没有了解的欲望，于是乎陷入了恶性循环。

为了解决以上两个问题，可以采取一些针对性的举措，比如：

(1) 为了增进历史学的学术交流，召开中韩两国双边性学术研讨会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之所以强调是双边而不是国际性的，一

方面是因为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尽管可能同时有中韩学者参加，但很难起到直接对话的效果，讨论很可能又欧美和日本的学术影响所主导。另一方面是因为中韩两国历史上有着大量的共同历史问题，但至今还没有被两国学者真正深入地一起讨论过，这里面存在着有很大的学术交流空间和增进彼此间了解的机会。

(2) 精选一系列韩国学者优秀历史研究类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是一项行之有效的举措，对改善两国学界目前的交流状况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学界已经出现过西方学者论著译丛，日本学者论著译丛这样的出版工程，但韩国方面的却一直没有，如果有，也只是些个别和零星的翻译出版。目前看来，很有必要开展一项体量较大的，较有显示度的系统性出版项目，丛书名可以是“韩国学者历史研究经典译著丛书”，这将会对改变目前中韩历史学术交流状况和推动中韩人文外交进一步深入具有重要的意义。

(3) 除了学术成果的翻译引介之外，学术资料的引入和出版也是加强中韩人文交流有效手段。朝鲜半岛历史上留下的文献资料，百分之九十都是用汉字书写的，这些史料中国学者利用起来毫无障碍，而且它们对研究中国的历史也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韩国文献资料的引入和出版，不仅是两国学术领域交流的重要表现，更重要的是还能够实实在在地为中国历史研究者提供价值极高的研究新资料，可谓一举两得。

总的来说，不论是召开双边学术研讨会，还是在中国批量翻译出版韩国学者的优秀人文学术著作，以及收集整理有助于中国历史研究的韩国历史文献资料在中国进行出版，这三项举措都是与“文化输出”完全不同的“文化引入”的表现。而这样的“文化引入”工作，能够体现出中国开放的心态和了解他者的愿望，进而从感情上赢得他者的认同，人文外交的意义也将由此得以体现。不仅如此，把这种从历史学学术角度展开的对于“人文外交”策略和举措的思考，扩展到其他的专业领域或文化层面，同样具有值得借鉴的意义。

## 后 记

为了推动对人文外交的深入研究，复旦大学由国际问题研究院牵头，与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文史研究院、哲学学院等社会、人文学科合作协同，组成了跨学科的一个小团队。本专题研究报告是在2014年9月27日举行的“人文外交与中国的战略”研讨会以及随后一系列小型讨论会的基础上集体撰写而成，作为复旦大学“人文外交”研究跨学科努力的一个初步成果。

以下是撰写该研究报告的执笔分工（以章节排序）：

**刘永涛**（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撰写第一章“总论”；第三章第一节“发达国家开展人文外交的经验”美国部分。

**邢丽菊**（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撰写第二章第一节“中国人文外交的文化基础”。

**简军波**（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撰写第二章第二节“中国人文外交的战略选择”。

**张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撰写第二章第三节“中国人文外交的制度建设”，参与第三章第二节“中外人文交流机制的现状与展望”的部分写作。

**刘丽荣**（复旦大学欧洲研究中心），撰写第三章第一节“发达国家开展人文外交的经验”欧洲部分。

**徐静波**（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撰写第三章第一节“发达国家开展人文外交的经验”日本部分。

**潘亚玲**（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撰写第三章第二节“中外人文交流机制的现状与展望”。

**王鑫磊**（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撰写第三章第三节“中韩人文交流展望：从历史学出发”。

**陶韡烁**（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参与本报告的统稿、后记撰写、文字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负责人文外交研究项目的联络、



协调和保障工作。

刘树才（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博士后），撰写第二章第四节“**中国人文外交的能力提高**”；参与本报告的文字整理和编辑工作。

奚伶（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博士后），参与本报告的文字整理和编辑工作。

林尚立教授（复旦大学副校长）、吴心伯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苏长和教授（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白彤东教授（哲学学院）、董少新教授（文史研究院）、陈玉耽博士（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和杨健研究员（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国际问题研究院驻所研究员）参与了“中国人文外交”相关研讨活动，为本研究报告的最终形成做出了具有学术意义的思想贡献。



復旦大學  
Fudan University